

“中国”的由来

编者按：62年前，陕西省宝鸡市出土了一件青铜器，后来被命名为“何尊”。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，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，距今已有三千余年。50年前，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，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唯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，曰：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乂民。”大意是说，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，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：我现在在中国安家（建都）了，统治民众。显然，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的“中国”，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“中国”两字。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“中国”呢？葛剑雄先生在著作《何以中国》里深入详尽地探讨了“中国”的由来。

■王常权

5800年前，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。距今5500年到3500年，在今浙江余杭良渚、山西襄汾陶寺、陕西神木石峁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处形成郡邑性遗址，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。距今5100年到4300年，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，跨入了文明阶段。距今4300年至4100年，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，中原地区持续崛起，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持续发展，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。夏朝建立后，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，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。

这些都邑和聚邑，被称为“国”（國）。“國”是一个象形字，中间的“口”代表人、人群，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。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，必须有人拿着戈守卫着。为安全起见，周围还要建一圈墙——外面的一大“口”。何尊中那个“國”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“口”。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，所以有了“万国”的说法。“万”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，而是一个形容词，“万国”形容国之多。相传大禹在涂山（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市禹会区淮河东岸）大会诸侯，“执玉帛者万国”。到夏朝，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，但肯定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。

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，国的数量应该更多。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强化，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，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，成为最大、最重要的国。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，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（今河南安阳殷都区）。殷虽然也是“万国”之一，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任何国之上，因而被称为“中国”。“中”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，用作集合部众。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“中”的周围，时间久了，“中”就衍生出“中心”“中央”“最重要的”等含义。中国，就是万国的中心、中央，万国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国，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“大邑商”。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“大邑商”后，可以向上天报告，“余其宅兹中国”。不言而喻，到了周朝，周朝的首都——原来的宗周和新建的成周——就是中国，其地位高于万国，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。直到东周初，“中国”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，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“都”。

进入春秋时代，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，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名存实亡。强大的诸侯在“尊王攘夷”的旗下互相争夺兼并，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，而是直接吞并。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1000多个，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。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相当的程度，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。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有更大的土地、更强的实力。“中国”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，诸侯国，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，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。中国还被称为“赤县神州”，或称

为“神州”。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，实现统一，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中国的地位，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，各自的“中国”概念也得以延续，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的琅邪台刻石中称：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，西涉流沙，南尽北户，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。”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。

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，这个“中国”概念尚未普及，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的、狭义的“中国”概念并存。狭义的“中国”相当于中原地区，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所说“皆中国人民所喜好”，“中国人民”即指中原的居民。一方面，“中国”就是汉朝的代名词，尤其是对外而言，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，萧望之提出的原则是“使于中国不为叛臣”。另一方面，在汉朝内部，“中国”的定义还不一致，如对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区，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，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。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，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。

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，东汉、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无不以中国自称，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。无论朝代如何更迭，皇帝如何易姓，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，从未间断。在分裂时期，分裂的双方和各方，只要有统一的愿望，或者为了取得合法性，都会以中国自居，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。但当统一恢复，双方或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，即都被承认为中国。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，统治了华夏，或者入主中原，或者统一了全国，也必定会以中国自居，如西晋、十六国时期匈奴建的汉、前赵、夏、北凉，巴氏建的成汉，羯人建的后赵，慕容鲜卑建的前燕、后燕、西燕、南燕，氐人建的前秦、后凉，羌人建的后秦，乞伏鲜卑建的西秦，秃发鲜卑建的南凉；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建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；以及后来的南诏、大长和大理，渤海、契丹建的辽朝，党项建的西夏，女真建的金朝。

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平定天山南北，实现了空前的统一，疆域北至唐努乌梁海（今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）、萨彦岭、额尔古纳河、外兴安岭，南至南海诸岛，西起巴尔喀什湖、帕米尔高原，东至库页岛，使中国的概念扩大到1300万平方千米的空间范围。但清朝的国号、正式名称还是“大清”“大清国”，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，除《尼布楚条约》因没有中文文本（是满、俄、拉丁三种文本）而使用“中国”一词外，其他全部称“大清国”。“中国”一词还有两种用法，有时是指清朝全部疆域，有时仅指直隶、江苏、安徽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十八省，而不包括满洲（东北）、新疆、乌里雅苏台（今蒙古国大部，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中国新疆各一小部分地区）、青海、西藏等。
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在多数场合即称“中国”。从此，“中国”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，其空间范围覆盖我国的全部领土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“中国”作为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。

古代王朝的“国庆”

■直良巨员

在君主制绵延了两千年的中国，古人们的“国庆”指的是“国之庆典”，欢庆的是国家喜庆之事。主要是围绕皇权进行的庆祝活动，如皇帝的登基、生日、婚娶、更换年号等，可以说，古代的国庆节与如今的国庆节是截然不同的。

一

追溯到秦汉时期，中国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庆节，甚至连生日庆祝的习俗也不存在。据宋人赵彦卫笔记史料《云麓漫钞》记载：“魏晋以前，不为生日”。当时人们更多地使用生辰八字来占卜命运而非庆祝生日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生日的概念逐渐传开，为后来国庆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。

现代学者一般认为，中国人开始重视庆祝生日是受佛诞日的影响。据佛教经典记载，释迦牟尼诞生日为农历四月初八（一说为二月初八）。这一天南亚地区的人们会郑重清洗佛像，将之放入车中或轿中，四处游行，接受信众的礼拜和供奉。

这种习俗随佛教传入中国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就曾载道：在北魏，每到四月初八，太武帝拓跋焘都会亲自登上城门楼，观看浴佛游行的盛典。佛诞纪念日的流行，直接影响了六朝人对生日的观念。

据《颜氏家训》记载，南朝梁元帝在每年的生日那天会“设斋讲”。到隋朝，隋文帝杨坚曾颁布法令，自己生日当天全国不得屠宰，两者都是受了佛诞的影响。

“国庆”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，大诗人陆机的《五等诸侯论》中提到：“国庆独飨其利，主忧莫与其害”。这表明在古代，确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国庆庆祝活动。

南朝宋鲍照《数诗》里写到：“三朝国庆毕，休沐还旧邦。”诗中的“国庆”指的是正旦（正月初一）也就是元旦。

唐·司空图《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》记载：“翌日堰乃成，……徒令邑里交贺，合乐以迎之，流闻京师，中外以为国庆。”这里的“国庆”又不同于前面说的时令节日，是因事而庆，指堤坝建成后，举国同庆。

《史记》记载文帝登基之夜，下诏书曰：“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酺五日。”你看，皇帝登基，不仅大赦天下，还赐民众酒食，真是“君王乐，则百姓喜；举国欢腾，谓之国庆”。

这么看来，古人们可比我们幸福多了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个“国庆”！

二

到了唐朝，古人们才终于有了一个与今天较为接近的“国庆节”——举国为皇帝过生日！为皇帝庆祝生日，已成为宫中一项经常性的“君臣同乐”活动。

玄宗即位以后，很快展现出惊人的领导手段——平息了宫廷斗争的隐患之后，对内轻徭薄赋、鼓励农桑，保证了国家的稳定，对外采用军事与和亲并行的政策，在与各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。

以上这些功绩让玄宗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不世出的圣人。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，在几经推辞之后，他在泰山完成了封禅大典，向当今和后世人宣告自己是受天地眷顾的优秀君主。

封禅后第4年，玄宗这一天照例为自己庆生，宴请百官。宴席结束后，当年带头建议玄宗封禅的两位丞相源乾曜和张说，率领文武百官上了一通奏表。

其大意是：自古以来，圣人的生日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像陛下生日这个“二气含神，九龙浴圣，清明总於玉露，爽朗冠於金天。月惟仲秋，日在端五，恒星不见之夜，祥光照室之期”的美好时刻，理应被定为每年固定的节日，好让天下百姓庆贺自己得逢盛世啊！

听罢，玄宗当然是龙心大悦，当即下令第二年（开元十八年）开始设立“千秋节”（八月五日），并将此节“著之甲令，布于天下”，后每至千秋节，唐玄宗、杨贵妃都在京师长安兴庆宫内花萼楼，或在东都洛阳内广达楼前举行盛大宴会和乐舞表演，与文武百官、百姓同乐。

除了大开宴席，据说在“千秋节”这日，朝廷还制定了与之相关的休假制度（咸令宴乐休假三日），如此，听起来是否有“国庆”的意味了呢？

“千秋节”，后更名为“天长节”，成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。在这一天，朝廷官员可以享受三天的法定假期，而民间则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。

庆祝活动包括宫廷宴会、民间的歌舞、戏曲表演、祭祀仪式等。在唐朝，宴会上会有雅乐杂技、动物马戏以及宫人表演的乐舞。其中，马戏舞马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。

三

自唐玄宗以个人寿辰作为法定节日后，后代皇帝也纷纷效仿，这就不得不提起“圣节”，“圣节”对于唐、宋两代帝王诞辰的统称，如“千秋节”也属“圣节”，其在唐代就有了雏形，只不过在宋代的庆祝仪式和活动较为流程化。

宋代几乎所有的皇帝以及部分皇后、太后都有圣节。如宋太祖圣

节长春节、宋太宗圣节寿宁节、宋真宗圣节承天节等，由此可见，“圣节”在宋代已经成为皇帝的定制品，且节日当天的礼仪非常隆重，比如簪花、上寿、敬酒、奏乐、赐物等，以及发布禁屠以及赦免一部分罪犯的政令，当然，官方还允许官衙休假日，以彰显政通人和的景象。

宋代还有一个最贴近于现代国庆节的节日，名为“开基节”，顾名思义，此节是为纪念宋王朝的建立而设定的节日，即王朝基业的开始，为每年的正月初四，并被纳入五礼嘉礼之中。据说宋代官员在开基节这天也会获得五日的假期。

到了宋代，国庆的庆祝方式更加注重文化，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的美食，文人墨客们会借此机会吟诗作对，龙舟竞渡、歌舞升平等文化活动层出不穷。

到了明代，“万寿节”之名取代了“圣节”。万寿意为万寿无疆，也是为了给皇帝祝寿而制定的节日，“万寿节”在明代中的地位非常之高，与“元旦”“冬至”并称三大节，为当时宫廷中重视的礼仪活动，并一直流传至清朝。

每逢万寿节，在京的王公百官会进宫朝贺，各地的文武百官则设置香案，向京城的方向行大礼，京城的匠人们还会提前对街道进行装饰，节日期间还会禁止屠宰、不理刑名，举国欢庆，到处歌舞升平。

到了清朝，康熙帝的六旬万寿盛典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其规模之大、筹备之精细，堪称历代之最。

文艺表演同样是古代国庆庆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所展现的舞剑、吐火等民间文艺，便是在这种重要场合中大放异彩。唐玄宗时期的千秋节，就有精心策划的舞剑、摔跤、吐火、走钢索等表演，甚至还有骏马在大力士举起的木板上跳舞的壮观场面。

明清时期，国庆庆典中，有满族特色的鹰旗颁发、射箭比赛，也有汉族传统的舞龙舞狮、耍花灯等，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尊重，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。

明朝皇帝亲自主持祭祀仪式，向祖先与天地神灵致敬。民间文化活动如书画展览、戏曲表演等，也是庆祝的一部分。

到了清朝，文艺表演的形式更加多样，各地衙门、会馆、商铺张灯结彩，闹市区悬挂彩幔，舞榭歌台处处精心布置，彻夜通明，营造出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。

随着时代的更迭，国庆节的含义、时间、内容皆有不同，但不变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期盼和平、国泰民安、丰收祥和的民族精神。

在这些庆祝活动中，人们不仅享受物质上的丰盛，还追求精神上的满足，通过各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。



古人宴乐图。AI制作